

史 学 论 文

历史的使命与政治的变革

任 继 愈*

—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

历史的使命是关系到全民族每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的奋斗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大事。历史的变化 似乎有意识又似乎无意识 有时像前进 有时像徘徊 有时又像倒退。当时的参加者 好像在密林中旅行 走的路径对不对 当时看不清楚。等到走出密林或登上高山 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路，才能做出清醒的判断，中华民族确实是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过来的。

中华民族的先辈开拓者从西周起 即凝聚力量、总结智慧、积累文化资料 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 在广大的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了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盛况，把华夏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在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有些地区差异，但整体上属于同一的文化共同体。秦汉以后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延伸。华夏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正如古希腊文化在欧洲的作用一样。

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从春秋战国开始提出了新的目标，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战国中期 有识之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 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提出建立统一中国的种种设想。先由少数人提出方案，然后有更多的人去推动这一方案的实现。战国时期，通过兼并战争逐渐消灭掉世袭诸侯割据的局面，借助诸侯国当政者贪婪的欲望，推动着兼并战争，最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秦之后的汉朝继承了秦的事业。

秦汉的统一不能简单看作秦始皇、汉武帝雄才大略、个人野心的产物。早在秦汉统一二百年前，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先后提出过许多统一方案。秦始皇、汉武帝使设计图纸变成了建筑物，起了建筑师的作用；真正指导他们产生行动的力量是民族的历史使命。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使命要求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 建立‘四海一家’的统一大国。秦汉创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教授

业者顺应了时代潮流，运用政治变革手段，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从秦汉算起。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有所贡献，应当说是从秦汉开始的。

历史使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为了实现历史使命，必要进行政治变革。政治变革是为了完成历史使命而出现的措施。史家每称汉承秦制，秦统一六国后很快又陷入了混乱，汉朝结束了秦末混乱的局面，完成了秦朝的未竟之业。从秦到汉完成的是同一个历史使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变革。回顾一百多年来的这些政治变革，有的使人惊心动魄，有的令人扼腕叹惜。这些政治变革都体现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即如何使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政治变革在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政治变革好像接力赛跑，接力棒从不同的运动员手中逐个传递着，沿着固定的跑道、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因为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民族的自我意识比较成熟。从鸦片战争起，有识之士就提出自强、维新、天演、竞存 抵御外国侵略势力 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 最后推翻外国殖民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建立新中国、实现现代化。政治变革的领导者不断改换，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却未曾改变。

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历史有盲目性，有人认为历史有目的性；有人认为有规律可循，有人认为无规律可循；有人认为历史在进步，有人认为历史只有变化而无所谓进步。事实上 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已不愿回到‘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有了文字及传递信息的工具，已不愿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这种变化，确已包含着进步和提高，而不是无意义的场景变换。

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从秦汉到清末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由秦汉到唐末五代为第一个阶段，由北宋到清末为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建立、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融合中华民族为一体，寻找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政教体系——三教 儒教、佛教、道教 合一 为期约一千年。

第二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完善、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大一统的新经学，完善政教合一的新儒教，使它完成自我调节统治国家的机制，使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统一的政治制度达到和谐、融洽。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都从各自的岗位发挥协调作用。

如果透过政权转移的现象，不难发现，历史前进确有规律可循。如宋、元、明、清 王朝几

度更迭 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却按照既定的航向前进。宋亡于元 明亡于清 有多少爱国志士认为是“天崩地解”。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作为社会政治制度来看 后一朝代的许多政治措施和文化思想体系 却直接沿着前朝的轨道 继续前进。不但没有中断 而且在前朝的基础上 还有所发展。儒教在宋代建立，北宋国势不振，南宋偏安于一隅，儒教没有普及的地区还很多。元朝取代宋朝 把儒教的影响推到更边远的地区 像云南各州县的文庙即建立于元朝。元儒成了宋儒的直接继承人 许衡、姚枢、耶律楚材都是儒家正宗。女真族入关后 为了巩固其政权，曾大兴文字狱，有过种族歧视，但宋元明以来的儒教思想体系继续为清朝承袭，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教条 仍被清朝全部继承下来。宋、元、明、清四朝遵循的立国原则和思想体系竟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成熟、定型化。小农经济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致使明清时期有几次在个别地区发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终未得到孳长的机会。

封闭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无求于人，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自我满足、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一个原因。

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在世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 中国处于被动的劣势 面临着危亡的境地。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要生存、要发展 这与过去二千年（从秦汉到清末）的形势有所不同。二千年来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小农经济的生存 完善封建体制 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 巩固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受到外来资本势力的冲击 不自强就灭亡。外来资本势力在于打破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 的体系 为资本开辟道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一旦打破 长期形成、行之有效的统一格局也受到挑战。不管自愿不自愿，必须打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这种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也是无可奈何的，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使命。

打破小农经济的封闭状态，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变成殖民地，一种是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二者必居其一。中国人不愿亡国，力争奋发图强。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 开始不完全自觉 进而开始自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 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些政治变革 细分起来 有许多主客观原因值得剖析 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趋势，即破除小农经济的束缚，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传统的民族，与其他古老民族相比，这一点尤为明显。我们的历史典籍 形式多样（编年、纪事……）总地看来 多属于政治史、王朝史、统治天下经验的总

集，给人的印象是政治变革的历史。如果站在更高的高度，开拓视野，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中华民族对多民族的融合，对科技发展、文艺创作诸方面都有贡献。作为历史任务，中华民族很成功地协调了政治高度统一与经济极端分散（小农经济）的基本矛盾，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下，使生产力得到较充分的发展。通过政府的协调，统治者善于利用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集锱铢为丘山，把有限的社会财富集中使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如漕运、边防、水利、文教建设、以丰补歉的救灾经验等 给后人留下大量精神财富。

鸦片战争以后，形势起了极大变化，中国几千年的旧经验不能应付新局面，与中国竞争的对手是代表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比封建制度高出一个发展阶段。两种文化相撞击 中华民族显然处于劣势 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奇变”。有识之士提出了多种对策 并进行了多次政治变革。这些变革 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 对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大量研究。后人从中看到前人的失误 有的化险为夷 有的坐失良机 有的由于颠预，有的出于鲁莽，但算一笔总帐，不难看出每一政治变革都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他的历史使命，每一政治变革都是在推动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都是在促进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每次思想变革，都是历史使命的体现。

历来有不少领导政治变革的领袖人物（或集团、政党）希图毕其功于一役 总想亲眼看到太平盛世在自己手中实现。追求短期效益 往往失败在急于求成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想快 反而慢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完善政治机构、改进行政效率、沟通民意、普及教育、提高国民道德素质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困难很多，有外部的干扰，也有内部习惯势力的惰性造成的阻力。

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历史使命是推进现代化。在这个伟大历史使命中，有人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认为它发挥了冲击旧思想堡垒的作用，有人认为它没有达到它所号召的民主、科学的目的 有人认为它偏激、片面 中断了文化传统。各种不同的理解 出于对历史使命与政治变革性质的混淆。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它长期奋斗的方向，它要通过许多政治变革的措施逐步实现 有时要几代人，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才可以显示出它的实效。五四运动只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中途站。

还要看到，推动历史使命的人物与参与政治变革的人物是两种类型，不能一身二任。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历史使命的指路人，但他们往往不具有参与政治变革的能力，有时由于不具备政治变革的条件。如孔、孟、荀、老、庄、韩非、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人 都从各自的角

度指出当时的历史使命，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巩固和发展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和理论。杰出的政治变革家 如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等人 能把哲学家、思想家的图纸变成建筑物。董仲舒是汉武帝统一王朝的设计师，为了一件小事，董仲舒几乎死于武帝之手。程朱是巩固宋王朝的设计师 却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从根本上看 董仲舒与西汉王朝、程朱与宋王朝的统治者血肉相连，目标一致。

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在于为民族的历史使命设计蓝图，指出方向。到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将有另外一些人把图纸变成大厦。大厦落成时，当年的设计师们骨肉已朽。许多深沉博大、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思想家 往往命运多蹇 这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事 往往不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理解 甚至遭到误解。但是 必须看到 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在于他自己是否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而是看他们的理想是否符合民族的历史使命。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 不应妄自菲薄 要为促进民族历史使命而尽力。当务之急是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既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还要充实以社会主义的新内容。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都是完成历史使命所经历的政治变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年来不断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它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五十年 当务之急是解决几千年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 先要生存 然后是温饱 再就是发展。要求一个早上使旧中国彻底改观是不现实的。道路是漫长的，只要全民族对此引起重视 全力以赴 总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

刘 义 章 *

—

1898年 中国首次认真推行政治改革 开始走向政治现代化 不过早在这四十年前 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提出要改革当时政治制度的主张。这四十年政治改革思想，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将传统君权至上的专制政治改为“开明专制”；二、改“开明专制”为“君民共主”；三、由“君民共主”进而改为“民主共和”。

以上三个阶段代表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推动政治现代化所经过的历程。本文将从每个阶段选取一人，以他们的改革思想为代表，从而说明十九世纪下半叶迄二十世纪初（1859—1905）中国政治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三人依次为洪仁玕（1822—1864）、薛福成（1838—1894）及胡汉民（1879—1936）。此外 本文也略提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三人的改革思想 因为这样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来龙去脉。

—

洪仁玕是太平天王洪秀全（1814—1864）族弟 早年追随秀全接受基督教信仰。当太平军起义时，仁玕在广东家乡附近的清远当塾师。他到广西欲参加太平军，却无法与洪秀全等取得联络 后来为躲避清政府 于 1853年辗转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期间 他结识了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及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人。洪仁玕从他们学到西方的知识。1854年 他再次企图进入太平军辖区，却只能到达上海，这一次参加太平军的愿望仍不能实现。不过，他在港、沪两地亲身考察了有关西方政府的运作，从传教士身上他又学到许多西方的社会、

*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师

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这些见识及观察正是他在数年后综理太平天国政务时的准备。

洪仁玕于 1859 年初第三次尝试进入太平军辖境，这次他终能如愿以偿成功到达天京。他深得洪秀全信任，并旋即获封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成为天王的主要辅弼。他参考从港、沪两地所得到的西学知识，设计出一套政治改革主张，并且写成《资政新篇》。他在这部为太平天国重振雄风的现代化蓝图里，提出一系列兴革措施。这时太平天国是在内部自相残杀和翼王石达开率众出走后三年，元气大损。洪仁玕针对太平天国当时的处境提出广泛的改革主张，包括社会、经济、法律、外交、政治等方面。他希望通过全面改革太平天国的制度，从而使这一革命运动再焕发生命力。

我们将洪仁玕政治方面的改革主张称为“开明专制”，因为他一方面要树立中央权威，一方面强调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了下情能够上达，并使政府在决策时能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他建议让民间出版新闻纸，政府可以从新闻纸中获悉民间隐情，这样才能够作出最利民、便民的决策。为了采纳民意，洪仁玕更进一步建议各省设立新闻官，他们可独立行使职权，不隶属地方官府，亦不受地方官府管辖。最后，他更建议设置“暗柜”，即不记名意见箱，让人民可以无所顾忌地向政府反映任何意见。^③由此可见洪仁玕十分重视民心公议，他的目的是要将太平天国改革成一个讲求效率而又被人民拥戴的政府。

可惜，洪秀全对他这位族弟所提的建议大多持保留态度，例如他反对在满清被推翻前让民间出版新闻纸，也不赞成在各省委任新闻官，或设置“暗柜”，他认为这些设施将会被利用为颠覆太平天国的工具。他唯一赞成者是为收集民意而设立的新闻部。

虽然洪秀全可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拒绝洪仁玕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主张，但洪仁玕的改革是要在确立中央权威的原则下进行。他要培养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感，让他们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做到上下情通，使人民成为政府背后的支柱。他的主张并不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力，也没有要政府由人民选出；他只强调一点：政府必须设法听取人民的意见，即通过新闻纸、“暗柜”等新设施搜集民意，从而订出便民、利民的政策。

洪仁玕这种“开明专制”的改革主张，反映了西方思想对他的影响。他在港、沪两地约七年的居住期间，努力学习新知识，并且观察西方社会制度和政府的运作模式，认定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源。他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全面认识西方的一位先驱，他虽然未曾踏足外国，却能洞察西方富强的根源，并在 1859 年提出一套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外交等现代化的纲领，足以证明他的触觉敏锐，观察能力强。

洪仁玕的“开明专制”政治改革思想虽然未能推行，但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些开明主张，确也难怪可贵。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已有改革传统专制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洪仁玕能够将他的改革思想形诸文字，并且把《资政新篇》呈献给天王洪秀全，

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是个革命政权，一切仍在草创阶段，加上他本人与天王的血缘关系，于是才有机会提出这个在当时十分先进的改革蓝图。

三

为了能够比较清楚地显示改革主张从“开明专制”到“君民共主”的发展过程，这里略略提及冯桂芬、王韬及郑观应三人的政治思想。

冯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所著的《校邠庐抗议》论到改革政治制度时提出“君民不隔”。^⑤他的目的便是要达到君民上下情通，这与洪仁玕重视民意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两人所提出为做到上下情通的方法不同罢了。冯桂芬主张设置乡官审理民事，并让人民用诗表达民隐，^⑥这与洪仁玕主张设新闻官及“暗柜”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洪、冯两人无论在背景或际遇方面都迥异，前者是岭南寒士而为太平天国总理，后者生于江南世家，并曾以翰林出身而在朝廷任职，可是二人所提出的政治改革主张竟不谋而合。他们所强调的上下情通和君民不隔，便成为后来议院制的理论基础。

王韬(1825—1897)是最先亲身体会到西方君主立宪政制长处的中国知识分子。1868年至1870年，理雅各聘请他到英国继续协助翻译中国古籍的工作。他称英国君主立宪议院制为“君民共主”。他主张政府施政应“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⑦王韬这种思想对日后康、梁所领导的立宪运动有一定的影响。

郑观应(1842—1922)长期在上海当买办。他是较早公开主张设立议院和行君民共主制政府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⑧“达民情”这个主张与洪仁玕、冯桂芬等人所讲的“上下情通”是一脉相承的，现在郑进一步将民情与议院连在一起，即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革去达到上下情通。事实上，他在中法战争时已“上书政府，请开国会”。^⑨此外，他与洪仁玕一样，主张透过新闻纸来搜求民情，务求下情能够上达。^⑩

王韬与郑观应由于长期接触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并在港、沪等地与洋商和传教士来往，再加上他们留心考察西洋各国臻至富强的根源，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必须行君民共主的议院政治才能立足于当今“华夷联属之天下”。^⑪不过，由于二人从不曾接近清政府权力核心，王韬因为曾向太平天国建言而遭清廷顾忌，郑观应则只任职于官督商办企业，所以他们的主张始终不为清政府采纳。不过，当我们回顾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会发觉他们的见解的确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四

另一个较早推崇君主立宪政制的人是薛福成。与王、郑不同，他长期处身仕宦圈中，从 1865 年到 1880 年代初，先后参加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成为曾、李办理洋务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在协助幕主处理棘手外交问题如马嘉理案（1875）及朝鲜事件（1882）等都能提出中肯的对策。由于表现出色，于 1884 年实授浙江宁（波）、绍（兴）台（州）道。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负责筹措浙东海防，守卫浙江洋面。凭着他沉毅的应变措施，终于击退了曾对福建及台湾肆虐的法国舰队，保卫了国土。^⑫1888 年因功擢湖南按察使，第二年被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从 1865 年开始薛福成就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 例如在《上曾侯相书》里 他向曾国藩提出“养人才、澄吏治”。在《应诏陈言疏》（1875）中 他在两者之上 进一步提出“恤民隐”。^⑬这些建议都能切中时弊，因而受到重视，并获采用。^⑭到了 1879 年 薛福成进一步谈到变法 他不再囿于传统儒家经世思想，而主张仿效泰西，讲求变法。不过他这时所要效法者只限于西洋“器数之学”，目的是“取西人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⑮

薛氏的变法思想在以后十年间经历了长足发展，在出使欧洲时期（1890—1894） 他接触了英、意等国的君主立宪制 认为这与中国古代夏商周政制相同 他称之为“君民共主” 认定这种政制比君主或民主都要优胜。他在《出使日记》里一再流露出对“君民共主”政治的欣赏，可以看出他是希望中国改行这种政制的。^⑯

薛氏在宦海近三十年后，终于认为中国必须改变它的君主政制，否则不能立足于世界列国之林 即他所谓“中外联属之天下”。^⑰以一个长期在清政府内供职，最后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人而主张行君主立宪制，这个事实本身具有一定历史意义。

君主立宪政制在中国知识分子脑海中酝酿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终于在光绪皇帝支持的康、梁变法中成为改革方案之一。从现在看来，1898 年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年头。如果这次变法成功，那么君主立宪制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流政制模式。但清政权内部以慈禧为首的一派唯恐失去权力，血腥镇压了这次变法。

五

胡汉民正是处身于中国由改革过渡到革命这一划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生于广东番禺，父

亲胡文照是一位刑名师爷。由于父母早丧，他十六岁就与长兄清瑞开馆授徒，维持一家生计。^⑮关于胡汉民革命思想的起源，他自谓“十六岁时，即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民族思想油然而生。深感满清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⑯十七岁那年，他认识了革命党人史坚如。这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签下了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在北京领导“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图强，孙中山先生则在广州首次起义。

胡汉民目睹当时中国社会疲敝的景况和列强欺凌中国的局面，深深感到满清政府腐败无能。随着接触社会多了，愈加受到四周环境的刺激，他十九岁时就“思奋而改革之”。到了二十岁（1898）时候，他的“民族思想已不可遏”。^⑰这一年，胡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同年“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遇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当时他写了一副这样的春联：

文明新世界
独立大精神

充分显示出他的求新、求民族独立的思想。无疑，这个时候胡汉民的革命思想明显地包含着民族主义及民主共和的精神。

1900年孙中山先生策动惠州起义，史坚如为了与惠州的革命军相呼应，并破坏官军在广州的指挥中枢，决定谋炸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可惜事败遇害。胡氏虽然没有参与这次起义，但史坚如遇害一事对他影响很大，对他的革命思想也起了冲击作用。惠州起义后，国内革命党人大多逃亡海外，这时候胡氏觉得如果要与革命党人共同谋求救国之道，要继续追求有关知识，只有出国留学一途。为了筹款留学，胡代人考科举以换取酬金，并于1902年4、5月间到日本留学。^⑱

胡汉民在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攻读师范科。这次留学为时仅三个月，因为当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自费留学生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他率领同学反对蔡钧及日本政府当局。最后他提出退学书，并于同年7月离日返国。^⑲

他回国后，先后在广西梧州中学及广东香山隆都学校担任校长。这个时候，胡向学生讲授“学生修身学”，时常提及宪法、共和精神及自由思想，并且向学生说明当时中国已陷危难局面，呼吁学生救国救民。他的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却遭守旧官绅的排挤。^⑳

为了进一步追求革命知识，胡汉民在1904年冬第二次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攻读政治与法律。这次留学对他的革命事业及革命思想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他结交了后来共赴革命大业的汪兆铭、朱执信及廖仲恺等人，其次而更重要的是他在1905年加入孙中山、黄兴等人所组成的中国同盟会。

从加入同盟会开始，胡汉民的革命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他一方面在学业上求进益，研究政治与法律；另一方面吸收了新的革命思想，扩充了他的革命视

野。他除了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一职外，并且是同盟会本部秘书，因此他与孙中山接触的机会较多，深受孙氏革命人格的感染。同时由于他不断学习、思索，对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有很好的掌握。在日本短短的两年多期间，胡汉民的革命思想及他对革命本身的认识有显著的增长。

在一篇名为《民报之六大主义》的文章里，胡汉民具体地向世人陈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向与目标。他首先剖析了为什么要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他认为少数的满洲人压制多数的汉人，汉人没法发挥最大的才智，致中国陷于弱国地位和长久被外国欺凌的地步。其次，他解释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意义，认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阻碍了国家的建设及进步，只有实施民权立宪政治，中国才能“保种而竞存”。他说：“惟我汉族民族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充满，故能排满，能立国，而既已能排满立国，则探乎一般社会之心理，必无有舍至平等之制不用，而犹留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阶级也。”^②

胡汉民在同一篇文章里也详细论述孙中山所提出的民生主义。他同意孙氏的“土地国有”政策，主张土地权属于国家，国民有耕种权。而土地价增益最终用之于民。胡汉民同意土地国有，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曾行井田制度，^③故先“择其易者以从事”。在这里，胡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他并预言“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其成功非独可期，殆可预必也”^④

胡汉民从 1894 年到 1902 年生活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这期间中国经历了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康、梁维新及戊戌政变、列强强占沿海港湾，其后又有庚子拳变，他对国事忧心如焚。过去他曾憧憬中国可以借着改革而谋得富强，可是由于慈禧一派的胡作非为，以致把国家带到濒临灭亡的边缘，他终于对清政府不再抱任何希望，深信中国的中兴只有在推翻颞顽无能而专制的满清和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之后才能实现。

六

回顾约半个世纪以来，从洪仁玕到胡汉民，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而穷思密想，务求设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蓝图。他们当中或主张“开明专制”或鼓吹“君民共主”，或参加倒满革命，虽然改革方法与取向不同，但为求中国富强的目的则一。他们都认为传统政制必须改革，因为它阻塞了民情上达的渠道，为求“上下情通”，“君民不隔”，这班忧国忧时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朝的如薛福成，或在野的如王韬和郑观应等，都一致认为中国应行君民共主政制，只有这样，全国君民上下才能步履齐一地，为求中国的富强而同心协力。可是，当他们那经过漫长探索才得出的改革良方终于被采用的时候，结果却只是昙花一现。清政权的短视者白白地放弃了领导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迈进二十世纪国际政治舞台的良机。

为了国家的富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注释：

如果要全面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其他人物如汤震（著有《危言》）、陈虬（著有《治平通议》）、陈炽著有《庸书》）、何启、胡礼垣合著有《新政真诠》）以及清季其他开明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思想，亦应一并在探讨之列。本文是笔者就这一课题所作初步探索的结果。

参看 Ssu-yu Teng, "Hung Jen-Kan: Prime Minister of the Taiping Kingdom and His Modernization Plans", In *United College Journal* (Hong Kong: United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0-1971) . Vol. 8, pp. 87-95.

- ③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 页 532-534。
- ④ 同注 页 527 及 534。
- ⑤ 冯桂芬《复陈诗议》见《校邠庐抗议》(台北:学海出版社,1967 重印)页 106-107。参周辅成《冯桂芬的思想》，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页 32。
- ⑥ 同注。
- ⑦ 王韬《上大道论时务书》见《弢园文录外编》（香港中华印务总局 1883）卷 10,页 21。参王维诚《王韬的思想》见前揭《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页 46。
- ⑧ 郑观应《议院上》见《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重印)页 52。参周辅成《郑观应的思想》见前揭《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页 101-102。
- ⑨ 同注⑦,《日报》上下页 309-320。
- ⑩ 同注⑧。
- ⑪ 郑观应《易言》上卷 页 2。转源自刘广京、黎志刚合撰《郑观应 易言 ——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见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页 433。
- ⑫ 薛福成一方面协同宁波知府宗源瀚等地方官员建立严密防御工事，一方面运用外交，使孤拔不攻占舟山。详见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上，见薛福成《庸庵全集》() (台北:华文书局,1971 重印)页 460-465。
- ⑬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及《庸庵文外编》卷三，见《庸庵全集》()，页 13-22 及 235-238。
- ⑭ 同注⑫。
- ⑮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见《庸庵全集》(一)页 439-440。
- ⑯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见《庸庵全集》(二)(台北华文书局,1971 重印)页 1137 及 1305-1306。
- ⑰ 同注⑬ 页 439。
- ⑱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页 17。
- ⑲ 同上 页 17。
- ⑳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页 5。以下分别简称《自传》、《文集》。
- ㉑ 《自传》页 8。
- ㉒ 先是吴稚晖以保送事闹于清公使馆，公使蔡钧召日警自卫。日政府逮送吴出境。吴投河而获救。见《自传》页 9。
- ㉓ 《自传》页 10-11。

- ②④ 《民报之六大主义》见《文集》第一册 页 86。
- ②⑤ 在民初有关井田制度之有无的辩论中，胡汉民是主张夏商周三代时期井田制度确实存在过的。参看胡汉民、胡适等《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台北 1972 重印)。
- ②⑥ 《民报之六大主义》见《文集》第一册 页 88。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个方法学的探讨

杜 正 胜 *

引 言

考古学是二十世纪才从西方传来的知识，中国古代史却是本土的旧学问。世界任何民族的古代史都掺杂许多神话传说，科学的古史知识和观念唯有等待考古学的洗礼才能建立。这工作在西方人研究古代近东、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已有先例，在中国，随着治学方法的引进，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概念的提升，可信度较高、内容比较充实的中国古代史也逐渐形成。不过，由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殊背景，有些关键性的瓶颈问题尚待突破，目前距离理想的古代史研究还颇遥远。

本世纪初，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古史辨运动”。传统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建构的古史观被此运动一再质疑，摧毁殆尽。一方面，中国古代史研究被《古史辨》从经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恢复史学的本色，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古代世界也被顾颉刚著名的“层累造成说”真空化。古代漫长的数千百年，中国人在这漫长数千百年之间建立的社会，形成的国家，创作的文化，都落入朦胧的虚无之中。历史家可以用四个字评论此一运动，即“破而不立”。

“疑古运动”能破不能立是由客观条件限制的，文献一经怀疑，历史重建则无可凭借，而那时中国考古学几乎是一片荒芜。不过从方法上论，李玄伯先生当时就指出“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①陆懋德鉴于西洋上古史之研究，也呼吁历史学者借用考古家的证据。^②他们都相信古史研究的基础在于科学的考古资料，不能单靠强言博辩。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傅斯年宣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③同年，史语所开始发掘殷墟，寻找新的、可靠的古史新材料。历史研究于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

是走出故纸堆，不但摆脱经学的纠缠，而且超越文献批判，实证地重建古代世界的面貌。

殷墟的发掘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但就古史研究所需之资料而言，一柱究竟难以擎天。全面性新资料之充实是在 1950 年以后。然而由于马克思历史阶段论定于一尊，源泉滚滚的考古资料丧失它的主体性，变成唯物史观服务的仆役，1962 年出版的《新中国考古收获》即是这种指导观念下的产物。平实而论，从原始氏族社会经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划分法固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对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更宝贵的还是实事求是，从具体资料提炼概念，而非以既定观念指导资料。中国考古家数十年来利用考古材料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古代社会，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应该检讨；而如何结合出土新材料与古代典籍以建构符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也是我们应该思索的。本文准备分析近年考古成果对古史研究的贡献，并讨论考古学的历史解释所引起的争议性问题。现在先从考古年代学和考古类型学所建立的时空架构说起。

考古学重建古史的时空架构

历史学的基本要素是时间，时代标竿不确立，复杂万端的历史事件便无法安顿恰当的顺序。浸假而源流倒置，本末易位，便无历史知识可言。历史年代资料之缺乏和不正确性以古代史为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通现象。中国历史悠久，明白无疑的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这个年代在一般历史学中虽然不算太晚，但在古代史范畴内已经接近尾声。古史夏商周三代部分，传统年代学虽存在着不小误差，譬如关于夏朝开国上下限的估计便有两百年之差距^⑤，但仍有一些规矩可循，在此以前则毫无凭借。《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慨叹黄帝至夏禹记年乖异，足征古史纪年之难，何况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古史范围还远在黄帝之前呢。

以往考古学依赖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建立其年代，以便将复杂的考古资料整理出先后次序。^⑥但这种年代只具备相对性的意义，不能符合历史学绝对性的要求，所以这两门学科的年代学一直是自说自话。直到 1950 年碳十四测年法发明，绝对年代才进入考古学。虽然碳十四测年的数值有一两百年误差，若与地层和器物类型印证，还是可以建构概略的年代系统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首推夏鼐先生。^⑦他根据八十九个碳十四数据，以年为经，以地为纬，从公元前 5000—1000 年，分四个时段，七个地区，排出各重要文化和大多数遗址的年代。对于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约等于传统所谓夏代以前，历史标竿的建立，厥功至伟。我们可按各重要文化的大致时代，就其文化内涵，适度地重建古代的历史。这块原来属于传说的天地终于出现，虽然粗略，但相当可信的时代次序，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也才变为可能。至